

# 城镇化过程中城市广场的生产

李 怀<sup>1,2</sup>

(1. 西北师范大学 西北民族地区社会发展与地方治理研究中心, 甘肃 兰州 730070;

2. 中山大学 城市社会研究中心, 广东 广州 510275)

**[摘要]** 通过分析一个传统集市变成现代城市广场的城镇化过程, 深入探讨了政府(权力)、企业(市场)和居民(社会)等三个不同行动者对城市广场生产过程的影响。政府(权力)通过制定城市规划对城市广场的功能与性质进行定位, 主导城市广场的变迁趋向; 市场(企业)受到政府的招商引资政策而进入城市广场, 逐步变成一支独立的力量从中获取巨大经济利益; 以城市居民为代表的社会力量则以维权者的角色来影响城市广场的变迁过程, 他们用或由政府谈判或以集体抗争的策略来争取自己应得的拆迁补偿, 尽可能保全自己的既有利益不受损失。如此, 城镇化过程中城市广场的生产, 体现了政府、市场与社会三个行动者之间为实现各自利益目标而相互博弈的复杂竞争的实质, 这一过程并不是单方面地受政府主宰的结果。

**[关键词]** 城镇化; 集市; 城市广场; 政府; 市场; 社会

**[中图分类号]** C 912. 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9162(2013)06-0020-06

## 一、现象与问题

城镇化已成为转型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一项重要议题。城镇化的进程和结果将影响到社会生活的多个方面, 并关系到中国的未来走向。

城镇化过程必然引起城市空间的扩张, 而作为公共物品的城市广场也在城市空间扩张中不断被生产出来。广场起源于古代社会, 最早是氏族、部落进行聚会或仪式活动的公共空间。中国传统广场空间的演变规律可以总结为, 从体现神圣权威意义的围合空间向逐步满足城市市民需要的半围合空间的转变。街道广场空间正是后一种城市广场空间的典型代表。<sup>[1]</sup>

新中国成立以后, 以单位为基本单元, 集政治、经济、社会各项职能高度统一的城市空间体制的建立过程就是全能型的“单位”在空间上不断扩展的过程。<sup>[2]</sup> 城市广场的生产体现了浓厚的单位、政治与仪式性特征。改革以来, 随着城镇化的加速, 中国各地的城市广场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随着中国城市空间的快速扩张, 城市广场的商业和市场价值不断得到挖掘, 由地方政府主导的城市广场建设如火如荼、愈演愈烈, 几乎任何一个城市都有体现其地标意义的城市广场。

改革以来, 中国的城市广场建设并不是城市政府单一主导的过程, 市民或居民也并不只是把城市广场当作一个物理容器而生存其中, “我们可能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意识到自己根本上是空间性的存在者, 总是忙于进行空间与场所、疆域与区域、环境与居所的生产。这一生产的空间性过程或‘制造地理’的过程, 开始于身体, 开始于自我的结构与行为, 开始于总是包裹在与环境的复杂关系中的、作为一种独特的空间性单元的人类主体。”<sup>[3]</sup> (P431) 具体而言, 城市广场作为城市地标之一, 不单是一个物理空间的建设过程, 实际经历了一个复杂的“社会空间”生产过程, 其中既有政府的干预, 也有资本的影响, 更有市民或居民的抗争。社会空间不但包容了生产出来的事物, 也包容了事物的共时态的、并存不悖的、有序或无序的相互关系, 所以不应该将其降格为某一种单纯客体。<sup>[4]</sup> 基于上述背景, 本文对甘肃省东部某城市(下文简称TS市)一个传统集市变成现代城市广场的进程做了个案考察, 探讨在城镇化过程中, 政府(权力)、企业(市场)和居民(社会)三者分别如何影响了城市广场的生产过程? 在城市广场生产过程中, 这三个行动者又是如何为实现各自的利益目标进行博弈的?

**[收稿日期]** 2013-09-10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市场转型过程中‘典型单位制’变迁的路径依赖与资源约束”(10BSH047);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后期资助项目“城中村改造中的国家与社会”(08JHQ0018); 西北师范大学青年教师科研能力提升计划骨干项目“市场转型过程中‘典型单位制’变迁的路径依赖与资源约束”(SKQNGG11023)

**[作者简介]** 李怀(1970—), 男, 甘肃环县人, 社会学博士, 西北师范大学教授, 从事城市社会学、组织社会学研究

## 二、资料来源与研究方法

### 1. 资料收集方法

第一，文献法。本文的主要文献有：TS市档案馆对广场历史记录的文献，报纸杂志中有关城市广场记录的文章，市政府相关部门关于城市广场规划、改造、更新的政策与文件等。第二，半结构式访谈法。本文的访谈对象分为三类：一是亲历广场拆迁改造的原居民与目睹广场空间变迁的普通市民；二是经历广场规划与建设的相关政府官员；三是在广场四周做生意的商铺店主。笔者紧紧围绕“广场变迁事件”这个主题对以上对象进行了深入访谈。

### 2. 资料分析方法

本文的资料分析方法是话语分析。主要分析访谈对象（参与城市广场变迁的相关行动者）关于城市广场变迁的事件（记忆、描述、表达）的谈话版本是如何被建构出来，分析的重点是谈话的内容、谈话主题以及在政策、文件或媒体中对相关事件的说明，特别是分析当事人如何利用自己的“解释库”来进行这种建构。

本文的资料编码规则是：“类型—序号—性别—年龄”，“类型”表示相关访谈对象的分类，“1、2、3……”等表示访谈对象的序号，P表示当事人，O表示局外人，G表示政府官员，F代表女性，M代表男性。

## 三、传统集市的城镇化过程

本文调查分析的城市广场在历史上长期是一个繁荣的传统集市。TS市位于甘肃东南部，自古是丝绸之路必经之地，境内四季分明，气候宜人，物产丰富，素有西北“小江南”之称，同时也是华夏文明和中华民族的重要发源地，享有羲皇故里、轩辕故里的荣称。

### 1. 集市的形成（北宋元丰三年——清朝末年）

TS市自汉代设郡，魏文帝之后，改称秦州。据《TS市志》记载，文中所言的集市最早于北宋元丰三年出现，当时罗拯（1016—1080）做知州，在TS市取土修筑中城城墙，取土的地方形成了一个面积不小的坑洼之地。后来，TS市北面的罗玉河经常洪水泛滥，加之地势较高，洪水由罗玉河冲下直接淹没中城地势最低之处，久而久之洪水中的泥沙将这片大坑的地面冲洗得相对平整，这块平整之处后来成为当地人贸易往来的集市。北宋熙宁七年（1074年），宋神宗在秦州（TS市旧称）正式设茶马司，以茶易马遂成定制。元明清时，以茶马为主的商贸活动更为活跃，繁荣的商业贸易催生了TS市集市（城市广场雏形）的出现。<sup>①</sup>

据我爷爷讲，这里原来是一个大坑。坑有多深？坑里的房顶还没有路面高！站在集市的这头就可以直接看见集市那边的房屋。别看那个集市的地势低得厉害，从咱们迷信上说，那可是个金盆养鱼的聚宝地方，要不怎么就那里的集市最热闹呢！（O-1-M-83）

清朝初期，不断有外来商人在集市所在地周边搭建店

铺和住房，北端娘娘庙前摆摊设点的商贩受到外来商人的影响，也在庙前空地上修建数座店铺。清代末期，这里日渐形成了一处颇具规模的市场，有十几家店铺，经营珠宝古玩、图书字画、银物首饰、铁铜火盆等。<sup>[5]</sup>后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在这一带兴建店铺，行商坐商在此日渐扎根生长，来此地赶集的人越来越多，集市也日趋成型。

### 2. 集市的兴盛（民国初期——解放初期）

民国初期，集市的铺面由北向南又发展了几十间，多经营日用杂货，行商坐商在此扎根，形成了一条小街市，城乡赶集的人越来越多。<sup>[5]</sup>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TS市专员胡受谦下令整修了集市，并改名为民众市场，一些规模较大的商铺开始坐落于此。后来，集市周围商贾聚集，店铺林立。据1945年的一项统计，抗日战争时期，集市里有坐商53家，摊贩113处。集市里许多风味小吃远近闻名，有闻名全市的陈、万两家的醪糟<sup>②</sup>，人称“三碗辣椒”的夏马哥的面皮<sup>③</sup>、张大娃的油饼、刘黑求的熟肉等都闻名遐迩。更有百姓乐道的价格低廉的风味小吃，如张家祖传三代的浆水面、马元才的荞面饸饹、王三喜的面水饭、回民老李的羊杂碎等，都有着显著的地方特色。<sup>[5]</sup>至此，集市逐渐发展成为当地百姓眼中的“小天桥”。<sup>④</sup>

### 3. 集市的衰落（“文化大革命”时期）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政府强调国营经济与集体所有制经济至上，TS市的集市贸易也被作为“资本主义尾巴”加以批判并严格限制，动员个体商户上山下乡，城乡地区的集市贸易被强行关闭。

文化大革命时候，要除四旧割掉资本主义尾巴，集市里私人的小摊小商店都被强行关闭了，政府实行公私合营，有的集市摆摊子的人，都被纳入到了国营单位，这样人家也就再不用起早贪黑的自谋出路了。文化大革命后，集市的门市一下少了好多，冷冷清清，就只有几家卖破烂的。（P-2-M-60）

改革开放之初，当我们再次回看昔日繁荣的集市时，地势低洼的集市区已彻底变成了一个破烂的旧货市场，并逐渐变成了TS市城区的棚户区最集中的地区，也是TS市名副其实的贫民区。（P-3-M-70）

这样，过去在当地居民记忆深处的繁荣集市逐渐走向了衰落。

## 四、城市广场的生产：政府、企业与居民三者之博弈

### 1. 政府（权力）对城市广场生产的规划

1950年，TS市人民政府成立，1958年4月至1959年10月，省勘测设计院与TS市委城建部门对TS市功能分区做了总体规划，形成了城市规划的雏形。1981年，市政府将制定的《TS市城市总体规划大纲》报省政府批准立项，确定以集市广场为中心区域的城市空间布局。1983年，省政府原则批准了“TS市总体规划”，此后经过不断完善，1989年，省政府委托省建委以甘建发（1989）228

号文,对《TS市总体规划(修订稿)》予以批复。<sup>⑤</sup>“规划”提出,1995年前建成城市广场,将其作为未来城市公共交通集散、经济文化生活的中心,围绕城市广场的其它建筑布局为:在城市广场以东建设文化展览馆,以西建设综合性商场,西北建设邮电大楼,东北建设综合性饮食服务餐厅,以南建设文化科技等大型建筑,调整和增加公共交通线路,仅有的四条公交线路都途经城市广场,使广场成为城市的交通枢纽中心。<sup>⑥</sup>

从1980年代后期开始,TS市就开始进行大规模的旧城改造更新。1990年6月,市政府领导直接指挥对集市所在的棚户区进行拆迁改造。1990年10月,城市广场建设指挥部成立。1992年7月至11月,城市广场的绿化、装饰及配套工程完工,建设面积1.1万平方米。1993年,市长办公会议研究决定,将城市中心广场西侧进行综合开发,建设成为“中国西部商品交易会”场馆——“展贸中心”。市政府成立了拆迁领导小组,确定了“展贸中心”建设的资金来源、开工与竣工时间。最后,由新建开发公司和天港房地产开发公司各按50%的比例入股,共同投资开发建设,保证1994年9月“西交会”召开前完成“展贸中心”主体工程。7月初,历时四十天的展贸中心建设用地拆迁工作完毕。<sup>⑦</sup>1994年7月,市政府对拆迁工作表示肯定:“拆迁工作,受到广大市民的理解支持,住户和工商户得到妥善安置,政府是满意的。”<sup>⑧</sup>

自对集市所在区域的建筑拆迁改造以来,市政府做了大量的组织和协调工作,听取了居民对拆迁补偿的看法和意见,解决有关搬迁、资金和施工中的疑难问题,共安置棚户区居民101户,其中市政府解决31户,省市属企业解决49户,区政府解决21户,拆迁总面积达5300平方米,比原建筑面积扩大了2.7倍。<sup>⑨</sup>同时,包括地下停车场在内的周边幢幢写字楼、购物大厦等标志性建筑渐次拔地而起。如此,昔日被当地居民称为“龙须沟”的低洼区集市所在地,逐渐变成了一座集娱乐、商贸于一体的综合性城市广场,城市广场成为了TS市的交通枢纽中心、商贸中心与最大的公共休闲空间。

## 2. 企业(市场)在城市广场生产中的谋利

城市作为一种社会空间存在,是一种物化的资本力量,这种力量表现为典型意义上的经济要素的攒聚。<sup>[6]</sup>19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城市建设已进入黄金时期,城市建设与城市空间扩展一改过去由政府出资组织实施的计划经济模式,开始利用市场融资来挖掘城市空间的商业价值,吸引房地产商等资本力量来开发城市空间的热情持续高涨,整个城市变成了一架“增长的机器”。<sup>[7]</sup>

市建设局副局长JXD说:

中国城市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应该就是计划经济阶段,有多少钱,干多少事。第二个阶段就是负债建设,主要集中在1990年代。第三个阶段就是现在的城市建设模式,投资模式,就是经营城市。城市广场的变化也正是得益于此。1992年有了现在的雏形。1996年重

修,2006年,城市广场经过大规模的整修后变成了现在的模样。(G-4-M-47)

1992年,16家房地产开发公司和五大银行共预计投资3.28亿元,重点围绕城市广场西侧、东南侧、西南侧进行整体开发。城市广场西侧建两栋24层东西走向的综合楼,预计投资1亿多元,以五大银行为主投资筹建。上文所说的“展贸中心”工程,是由新建开发公司和天港房地产开发公司各按50%的比例共同投资开发建设的,政府给予了一定的优惠政策。“展贸中心”自1993年10月动工兴建以来,如期为1994年的第六届“西交会”提供了4万平方米的展馆场地,而并未整体建成。这一年“西交会”结束后,建设工程进展缓慢,主要原因是资金缺口太大,政府无力来投资建设,最后还是由开发商来投资建设起来的。

中国的城市空间扩张运动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城市更新运动在一些方面很相似,同样都离不开资本的进入与参与。1970年代末出现的新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研究发现,在西方国家,资本以不同形式流通推动城市空间的扩张,促进了城市土地价值的飙升。1990年代后,资本力量在中国城市空间的生产以及塑造城市环境方面的作用越来越大,资本造城现象十分明显,如很多旧城改造或拆迁,新的城市建设都是由一些房地产商经营,一些城市的大片土地被房地产商开发。<sup>[8]</sup>

## 3. 居民(社会)在城市广场生产中的维权

上文说过,集市所在区域是一个低洼地,随着政府的城市建设过程,那里的生活环境日趋恶化,住在集市南坑的居民也逐渐萌发了搬迁的想法。

84年的洪水把我们南坑先淹了,房子本来就是土夯的,水一泡就塌了,咱南坑的居民实在是住不下去了,都盼望着早点搬走。(P-5-M-76)

但对集市北坑的住户来说,他们居住的地势相对南坑较高,受洪水淹没的几率小,人身财产安全没有受到威胁,熟悉的人缘、地缘环境不断强化了他们的归属感,他们更愿意在此继续居住下去。

我们祖祖辈辈三代人都在集市住着呢,住习惯了,不愿意搬迁。如果不是政府要拆,那时候没想过要搬。(P-6-F-66)

实质上,在集市区域居住的居民最关心的是,政府所做的拆迁改造是否会损害个人利益,或个人利益是否会得到合理的补偿。

1984年TS市下了一场大雨,集市南坑的居民被水淹了,集市本来就是个大坑,比TS市的地面都低,让水渠保持通畅就特别重要。1965年罗玉河水泛滥,大水从城壕直冲下来,其他好多地方都被淹了,但这个地势很低的地方却没有淹,主要因为那时候集市住的人相对少,大家都经常自觉清理水渠,保持通畅,所以水灾时,从城北罗玉河冲下的大水,顺着水渠排入了南面的河道。但是,后来随着外来人口的增加,

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在集市、新街周围盖满了民房，人多地方也杂乱，即时通畅水渠的自觉习惯也被遗忘了。所以，1984年下的一场大雨，水渠堵塞，集市被水淹也就是意料之中的了，并且还被政府定为城市的“重灾区”。(P-7-F-60)

被定为“灾区”就不对，就被水冲了一次，何况还是南坑淹得比较严重，还达不到灾区的程度。道理很明显，就是政府逼迫我们要搬迁呢，当时谁都晓得我们住的这一块地方是中心地带，地段好、交通方便。(P-8-F-65)

如此看来，居民对“灾区”的看法与政府不同，政府把“灾区”当作对集市改造更新的合理理由，而居民认为，政府是为了自身利益来牺牲居民利益才让他们搬迁的，他们住在这里交通便利，不需要搬迁。

1990年的时候，政府决定拆咱们集市了，我没有单位，就靠在集市摆小摊维持生计，但是好处是，当时拆迁政策是，有单位的人由单位解决，没有单位的人，由市政府解决。按照政策，拆了给我们有住处就行了。作为咱老百姓，人家决定要拆了，咱们只能搬呗，再者，咱那个时候的老百姓思想上也想不了太多，不就是顾好眼前有住处就行了。(P-9-M-60)

政府制定拆迁补偿的总原则是：有工作单位的住户由住户所在单位解决，没有工作单位的由政府解决。具体来说，第一种是在集市的住房属于公房性质且住户有工作单位，这类住户由单位解决住房，根据统一标准，单位给予住房，这类住户在搬迁中可能出现的利益矛盾发生在与本单位之间。第二类是公房性质，但住户没有工作单位，这类住户由市政府按照补偿标准解决住房。第三类，私房住户，由政府集中解决。这类住户在搬迁中提出的异议最多，在集市100多住户中，有私房的住户达到10多户，占近10%。<sup>⑩</sup>

我的情况不像其他人的，他们都是公房，但我们的房子是私房，集市自从被TS市定义为所谓的“灾区”，我们这些住的是自己的私房的人，就被按“灾区”的低补偿标准给拆迁了，这样不公平，我们和他们的情况不同么，最后水、电都被切断了，硬是把咱们逼着搬走了。到现在我心里还是不舒服，想不通，一定要和他们讨个补偿的说法。(P-10-F-65)

我们家当时在集市里有一院房，属于私房性质。正北堂屋，东西厢房，而且南厢房还是集市里有名的饭馆“杨家馆子”，当时拆迁我们就很不愿意，一院私房按划定“灾区”后的不合理补偿标准硬被政府给逼走了，当时不搬，被拆迁队断水断电，最后一院房就换来了一间房，我越想越气，这些年我们这些受到不公平拆迁补偿的私房居民一直在联合上访，一直要讨个说法。(P-11-M-66)

如上所言，因为地方政府拿不出旧城改造的大量拆迁

费用，不得不通过换取土地收益的方式将拆迁工作转让给房地产商，房地产商因为利益驱动的缘故，在居民对拆迁补偿并不满意的情况下强行推进拆迁进程，使得拆迁中的矛盾变得非常尖锐。

我当年是最后一个搬离集市的，原因是我和父亲不在一个单位，根据搬迁政策：有单位的各单位解决。这样我和父亲就被分开了，父亲年龄也七十多了，这样就不方便照顾老人。后来我将困难多次向市上的领导说明，最后经过市政府、区政府、拆迁办会议商议，决定让我父亲的单位给我的单位支付六千三百元，将父亲的住房面积和我的合并在一起，这样，我的房子由三十多平米换成了一个五十多平方米的大房，当时来看，五十多平方米还算个大房呢！这样我的困难解决了，才同意搬迁的。(P-12-M-60)

其实，不难看出，居民与政府和房地产商对拆迁持不同观点的根本原因是，大家在这一地域范围内已生活了相当长的时间，尽管生态环境并不理想，但因为对熟悉的居住空间环境倍感亲切并产生了难以割舍的累积效应，长久强化了对居住空间环境的社区归宿感。正如著名社会学家帕克所言，城市不是人之间、各种社会设施、各种服务部门和管理机构的简单聚集，而是由各种礼俗和传统构成的一种心理状态，包含随传统而流传的那些统一思想 and 感情所构成的整体。换言之，城市绝非简单的物质现象，它已同其居民们的各种重要活动密切地联系在一起，是自然的产物，更是人类属性的产物，即城市的深层内涵是城市的社会结构和精神特质。<sup>[9]</sup>

## 五、讨论与结语

从传统集市到现代城市广场的城镇化过程，实质上体现了城市空间的生产过程。正如列斐伏尔所强调：空间是政治的，排除了意识形态或政治，空间就不是科学的对象，空间从来就是政治的和策略的，空间看起来同质，看起来完全像我们所调查的那样是纯客观形式，但它却是社会的产物，空间的生产类似于任何种类商品的生产。<sup>[10]</sup>从空间生产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就会将目光转向各种各样的都市建造、规划和设计——这是最为显著的空间生产现象。<sup>[11]</sup>

城市广场的生产过程，充分体现了政府（权力）、企业（市场）与居民（社会）三个行动者为实现各自利益目标的相互博弈过程，而非政府单方面主宰的结果。从个案城市广场的生产过程来看，其中蕴涵了三种不同的理性。

### 1. 城市广场生产的政治理性

从上文不难看出，地方政府对城市广场的生产过程仍然起着主导作用，政府作为城市资源的拥有者、决策者，有权力来规划城市，影响城市空间的布局与功能。这是因为，一方面，地方政府是城市管理的主要主体，另一方面，城市土地所有权属于国家，地方政府作为国家的代理者来管理城市土地。政府对城市广场的规划、设计与建设过程，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取决于城市景观等因素的影响，或者首

先考虑把城市广场建设成为实现政治目标的政绩工程或形象工程。质言之，政府的主导力量体现在对市场和居民两者关于城市广场生产的优先抉择权上。因而，城市广场的生产过程首先体现了强烈的政治理性。

### 2. 城市广场生产的经济理性

城市广场的生产也体现了企业（市场）在经济利益驱动下追求效用最大化的目标。城市广场在城市空间的地标位置让其商业价值也日益突显，在地方政府财政捉襟见肘的前提下，会吸引越来越多的企业家来投资于城市广场建设。改革以来，地方政府往往通过提供各项优惠政策，吸引资本投入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地方政府与房地产商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结成“合作”关系。地方政府有义务来改善城市环境，为城市居民提供良好的生活环境和社会环境，但城市建设需要的大量资金成为政府的棘手难题，即政府有所“需”。房地产商拥有大量的资本，他们尽可能寻找机会投资于城市建设并从中获取巨大经济收益，即企业家有所“求”，这样便在政府与企业（资本）之间形成了一种特殊的“供求关系”，既解决了政府建设城市的资金难题，也满足了企业家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目的。但是，企业家一旦进入城市建设，往往只愿计算经济利益得失，经常迫使政府不得不做出尽可能多的让步，如给予更多的优惠政策和措施，以保证城市广场建设项目尽可能顺利完成。如此，城市广场的生产过程也体现了经济理性。

### 3. 城市广场生产的社会理性

在城市广场生产过程中，居民必然处于弱势地位。在城市广场建设引起的拆迁改造中，居民与开发商之间是一种矛盾对立关系。房地产商依据政府给予的特权，直接面对居民，居民把目光聚焦在搬迁补偿是否合理，是否损害

自身利益等问题上。当民众不满意政府制定的拆迁政策和补偿标准时，最直接的行动策略是拒绝拆迁，而这一举动同时激化了居民与房地产商之间暗藏已久的矛盾。面对僵局，政府又以裁判员身份来调解民众与房地产商之间的矛盾。这样民众与房地产商之间的利益矛盾，可能会因地方政府的介入而被化解。如果地方政府的调解仍然不能达到居民的预期目标，双方的矛盾就可能更加激化。但是，从居民的利益诉求来看，一方面，他们往往看重的是自己原有利益不能损失，另一方面，他们期望熟悉的社区或家园能够保存完好，因为，在居民看来，城市广场生产中的拆迁补偿仅仅是对自己的房屋或土地所体现的经济利益的补偿，而他们原有的社区归属感是永远无法用货币来衡量并加以补偿的，这就是居民社会理性的表达。

上述个案分析如同近年来在征地、拆迁等城镇化过程中发生的故事一样，几乎无不是政府（权力）规划、市场（企业）响应，共同演绎了城镇化的方向与结果，社会（居民）的利益往往不能保障，因此衍生了诸多的社会矛盾与冲突现象。在政府推动的城镇化过程中，各地政府追求其自身财政收入最大化和政绩最大化目标。在上述利益目标驱动下，城市规划以经济活动为中心进行宏观功能区域布局，从而追求土地价值最大化和经济产出最大化，而不是以长远社会发展为目标对社会人文环境的优化作出整体考虑。由此造成的后果是，政府主导的城市空间布局在物理空间上将原有的社会分层和社会不平等加以固化。<sup>[12]</sup>因此，我们的结论是，中国的城镇化首先应是能够实实在在地体现社会（居民）利益的城镇化，而非政府（权力）规划、市场（企业）获利、社会（居民）利益受损的城镇化。

### [注 释]

- ① TS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TS市志（中卷）》，方志出版社1996年版。
- ② 万记菊花醪糟：始创于清道光年间的“万记醪糟”，距今已有150多年历史，是TS市历史上的名优小吃之一。万家醪糟的第三代传人万荣，在集市口（现市中心广场）设摊销售。
- ③ 三碗辣椒：辣椒有三种不同的调制方法，来满足不同的口味：一种是用清油浇的辣子，并掺有少许驴油；一种是用香油的辣子；还有一种是把辣椒籽捣细后再泼上清油，再加之他的面皮柔软适度，所以他的面皮在TS市风行一时，人们俗称“三碗辣椒”。
- ④ 小天桥：这里与北京的老天桥相比，北京老天桥形成于晚清时期，延续至20世纪50年代，是旧时北京民间艺人最集中的地方，也是北京民间艺术和市民文化的摇篮，有各种货摊和百货店，有茶馆、食摊和酒馆，有江湖医生和占星卜相者，多为娱乐场所。
- ⑤ TS市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委员会文件（TS市建发[1991]12号）。
- ⑥ 赵建强，邓承宗等人编：《TS市Q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局资料Q区域建志（上册）》，1994。
- ⑦ TS市人民政府文件《市政府第一次常务会议纪要》（天政纪[1993]1号）；TS市人民政府文件《TS市人民政府关于中心广场西侧综合开发有关问题的专题会议纪要》（天政纪[1993]11号）。
- ⑧ TS市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委员会资料《房地产开发简报》第4期，1993年7月9日；TS市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委员会资料《房地产开发简报》第5期，1993年7月31日。
- ⑨ TS市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委员会文件（TS市建发[1993]10号）。
- ⑩ TS市人民政府文件《市政府第九次常务会议纪要》（TS市政纪[1993]33号）。

### [参考文献]

- [1] 耿波. 旧北京天桥广场及其现代启示 [J]. 西北师大学报（社科版），2009，（4）.

- [2] 马学广. “单位制”城市空间的社会生产研究 [J]. 经济地理, 2010, (9).
- [3] [美] Edward. W. Soja. 后大都市——城市和区域的批判性研究 [M]. 李钧等译.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6.
- [4] 陆扬. 社会空间的生产——析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J]. 甘肃社会科学, 2008, (5).
- [5] 侯若志. “猪羊市”的记忆 [N]. TS市日报, 2006-03-12 (3).
- [6] 张鸿雁. 城市空间的社会与“城市文化资本”论 [J]. 城市问题, 2005, (5).
- [7] Molotch, H. The city as a growth machin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76, 82: pp. 309—332.
- [8] 张应祥, 蔡禾. 资本主义城市社会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J]. 国外社会科学, 2009, (1).
- [9] 陈锋. 城市广场、公共空间、市民社会 [J]. 城市规划, 2003, (9).
- [10] Lefebvre, Henri 1977, “Reflections on the Politics of Space”, in R. Peet (ed.) Radical Geography, Chicago: Maaroufa Press Ltd, p. 34.
- [11] 汪民安. 空间生产的政治经济学 [J]. 国外理论动态, 2006, (1).
- [12] 周雪光. 社会建设之我见: 趋势、挑战与契机 [J]. 社会, 2013, (3).

## Production of Urban Square During the Urbanization Process

LI Huai<sup>1,2</sup>

(1. College of Social Development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Gansu, Lanzhou, 730070, PRC;

2. Center for Urban Studies,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dong, Guangzhou, 510275, PRC)

[Abstract] This paper, via field work, investigates urbanization process of traditional fair into modern urban square from three different participants perspectives—the government (power), market (enterprise) and society (residents). The government position through the urban planning of urban square function and nature, tends to dominate the urban square; The market based on the government investment policy gradually becomes an independent force to obtain huge economic benefit; The urban residents as the representative of the social forces influence the changes of urban square, negotiating with the government and fighting for their own rights. Thus, the essence of urban square production i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is the complicated competition game among the government, market and society to realize their respective interests, rather than the government unilaterally dominates the results.

[Key words] urbanization; fair; urban square; government; market; society

(责任编辑 岳焄/校对 岳焄)